

顾准一家在中关村 13 楼

顾南九(高梁)(执笔) 顾淑林 顾逸东 顾秀林 顾重之



顾准
(1915~1974)

学者,思想家,经济学家。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。1957 年发表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》,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。后来,他两次被打成“右派”,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。在逆境中,他写下了《希腊城邦制度》和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等著作,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。

刚到中关村

我们家是 1957 年春节后(大概是 2 月中旬寒假期间),从建筑工程部宿舍搬到中关村的。今天的 13 楼,当时排 26 楼,旁边的 14 楼当时是 8 号楼,1958 年秋天我们搬出之前改为今天的牌号。我们住 13 楼一单元 106 号(最东头的一层)。

1955 年夏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。刚到北京时,父亲顾准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,母亲汪璧在建筑工程部。父亲 1957 年初结束党校学习,调中科院任综考会副主任,我们就从建工部宿舍搬到了中关村。中关村宿舍比建工部宿舍面积大了不少,里面的设施也高级多了。

当时全家 8 口人:父母、祖母和 5 个孩子。1957 年初,老大顾淑林上初三,老二顾逸东上五年级,老三顾南九上二年级,老四顾秀林即将上小学,老

五顾重之还在幼儿园。

刚到中关村时,首先的感觉是比较荒凉。当时那个大院,只有四周的楼房盖了起来,中间还是一片空地,荒草长得比小孩子还高,像灌木丛一样;院子外面路南(今中关村南区)是荒地,有许多柏树圈围成的坟地;西边供销社(今科贸大厦)旁边还是一片白薯地。第二是周围的人们比较“洋气”。我们刚从上海到北京时,感觉北京比较“土”,但在中关村“海归”科学家们面前,自己就成了“土包子”。邻居们互相之间很客气,彬彬有礼,妇女们互相称“太太”。每天傍晚,楼上某家就响起叮叮咚咚的钢琴声。清晨楼上地板嗡嗡响,大人说这是“吸尘器”的声音,是从外国带回来的。扫地可以用机器,过去从来没听说过。这样的消费水平,比国内一般人超前了 20 多年。

1957 年夏,大姐顾淑林在北京 56 中学得了金质奖章,保送上了 101 中学读高中。中学离家很近,但大姐还是选择了住校。

下面三个孩子在保福寺小学(今中关村一小)就学,校址就是今天的融科大厦(1958 年秋才搬到今天的一小校址),当时是个真正的庙宇,庙宇的名字就叫保福寺。正殿和偏殿用作教室,光线不太好,黑黢黢的。还记得校长的名字叫王金陵,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是个刚退伍不久的军人,高大英俊,听说他给高年级(五六年级)上课的时候,发现学生睡觉时会把粉笔头掷过去,打得很准,但是平常对同学很和善。学生来源主要是两部分:中科院子弟、居住在周围的农家子弟。中科院的子弟们普遍比农民子弟学习好,但同学们之间相处很融洽,相互间十分友好,老师也没有歧视谁的意思。记得母亲曾经说过,保福寺小学对农民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一视同仁,风气好。

保福寺小学对面是生物所、声学所和大操场。现福利楼(已拆)、新科祥园一带,当时还是一片麦田。再往南、往东,都是村舍和平房宿舍。天气不冷时,晚上在大操场时常放映电影,那是大人和孩子们共同的快乐时光。

父亲在综考会工作,经常工作到很晚,有时夜里九、十点钟我们小孩子都睡下了,外面小汽车灯光一亮,祖母就说,你们爸爸回来了。母亲在建工部(百万庄)上班,来回路途较远,每天上班要早起,晚上经常赶不上回来吃饭,十分辛苦。1958 年是大跃进年,所有的人都在加班加点工作,我们几个

孩子经常在傍晚的时候,穿过灌木丛一般高的荒草地,走到中关村公共汽车站去迎候妈妈回家。当时 32 路中关村车站还没有移到今天的位置,离家不算太远。

父母亲在家里共用一个书房。如果晚上两人都在家的话,常见他们两人面对面坐在书桌前用功。孩子们也不常去纠缠父母,家人常常是各干各的,家中的大小事情都由祖母安排,井井有条。

总之,刚住到中关村时,我们家里是一种太平而忙碌的气氛。

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

1957 年春夏,父亲出过三次差,一次是去海南岛(和综考会主任竺可桢一起考察雷州和海南橡胶种植农场的情况),一次去新疆。第三次是去苏联,然后到黑龙江,即中苏黑龙江流域的联合考察。就是这次出差出了问题。

从父亲自己写“历史交代”中,以及已得到的各方材料中,得知这次出差的大体情况:

苏联打算开发黑龙江流域,要在黑龙江左岸主要支流和黑龙江干流兴建若干水电站。在干流修电站,选址和库区淹没等问题关系到右岸,必须和中国方面合作。在苏方建议下,1956 年五六月间在北京举行了中苏合作考察的谈判会议,成立了联合考察组。

联合考察组中方组长竺可桢,带领中方考察队共 18 人(包括副组长顾准、副组长同时也是黑龙江副省长陈剑飞、水电部冯仲云、唐季友,以及吴传钧、冯景兰、王守礼、杨宣仁等)。苏方考察队以苏联生产力委员会主席涅姆钦诺夫院士为首,共 25 人。7 月 6 日两队会合于苏境内的海兰泡,乘坐苏联“拉左号”船顺流而下,进行为期三周的黑龙河流域联合考察,途经海兰泡、伯力、海参崴(苏)、佳木斯、鹤岗、哈尔滨(中)。

在考察过程中,中苏两方在关于干流电站选址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。苏方对选择上游某地的方案感兴趣。中方则提出在下游萝北县境内太平沟建坝的方案。考察队的水电部工程师唐季友积极主张后一方案。太平沟是

黑龙江流经小兴安岭峡谷的南口,地形地质条件良好,可能的装机容量为100~270万千瓦,但如果贮水水位过高,则苏联一侧淹没损失稍大。如果选择上游方案,则中方淹没损失大,装机容量也较小。竺可桢在事先的预备会上也同意唐季友的意见。

解放以来,中苏两国一直是盟友关系,我国当时确实也得到了苏联不少的帮助。当时不管在宣传上,还是在人们的意识中,都把苏联看作老大哥、我们的榜样(尽管苏共20大后党内看法已有所改变),所谓“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”;那时苏联人讲的话简直就是“圣旨”(就像今天不少人言必称“美国怎样怎样”作为论证根据一样)。“反苏”更是个不得了的政治错误。

不少国人有崇洋媚外心理,当时和今天都是一样的,只不过当年是崇苏媚苏,今天换成了崇美媚美而已。

一方面是某些中国人崇苏媚外,另一方面就是某些苏联专家的自大与骄横(当然不是指所有在华苏联人)。据父亲日后的回忆文字,中方的陈剑飞和苏方的涅姆钦诺夫,就是这样的一对活宝。父亲回忆“他(涅姆钦诺夫)在考察途中对我方领队人、科学院副院长、高龄科学家竺可桢极其傲慢……这种傲慢态度不仅对竺可桢如此,对我方其他考察团员也是如此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苏方提出的上游方案,几乎就是不容质疑的方案。

作为中方负责人之一,父亲顾准认为坝址选择方案的讨论是关系到双方权益的问题,他支持太平沟方案,也支持唐季友工程师对选址问题提出不同于苏方的意见(似乎为此和同为副组长的陈剑飞发生过尖锐争执)。某日中苏双方讨论坝址问题,唐季友发言称:上游方案,发电量小,中方淹没损失大;太平沟方案,发电量大,缺点是苏方淹没损失大。综合比较,主张太平沟方案。话音刚落,陈剑飞当场训斥道:“我们是一家人,什么中方苏方的!”

此后一直到今天,在黑龙江干流修电站的事情始终没有实现。

中苏联合考察20年后的1978年11月,老四顾秀林在离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返京之前,曾经前往鹤岗市萝北县太平沟乡,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,找到了当年开挖的坝址勘探沟现场。20年过去,宽深各一米的探沟在树木草丛中完整保存,沟宽沟深尚存半米多,从山坡蜿蜒向下,一直到达江水

边。当地人甚至还记得勘探队到达和寻址、挖沟的那件事。

顾准自己回忆：“我……请示聂总，并在取得聂总指示后，在考察工作的整个过程中，采取了遭到陈剑飞坚决反对、被诬为反苏的立场。……在太平沟问题上……我对之担负了政治责任，我当然要毫不犹豫地为之而斗争。”

考察组 6 月底回北京。还在考察途中，顾准的“反苏行为”，显然已被某党员副组长报至北京。父亲刚回家，老朋友林里夫（时任中科院经济所所长）就上门，两人关在书房里谈了很久，看来林已经知道内部精神了。

父亲当了“右派”

其实，即使父亲没有黑龙江考察一事，他的“右派”帽子也是跑不了的。1956 年经济学界曾就“价值规律作用”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，多数意见还不能逾越斯大林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的理论框架。父亲当时兼经济所研究员，他认为苏联人提出的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”体系不过是“钦定的规律”，是“不能反映再生产实质”的东西，研究经济规律要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现成的理论教条出发。他认为真正贯穿于经济运动全过程并反映其本质的，还是以经济核算制为基础的价值规律，计划的制定也不能违背价值规律这个基础。为此他下了很大功夫、几易其稿，写了《试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》一文，文中否定了苏联的理论框架，主张可以在所有经济领域和各种程度上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，直至“任令价格浮动调节生产消费”。这在当时是最鲜明的“离经叛道”观点。此文发表在《经济研究》1957 年第 3 期，很快招致来自经济学界的尖锐批判。因为这篇文章，今天父亲被人戴上“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”的桂冠，但在当时，父亲和全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7 月份反右斗争全面展开，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黑龙江考察情况，就开始挨批判。批判拖得很长，我们在中科院的档案看到，父亲最后在“右派登记表”上签字的时间，是 1958 年某月某日。当时，这些事大人没有告诉我们。

水电部唐季友工程师也被告了刁状。据唐 22 年后的回忆：他刚回部就

被叫到副部长(李锐)办公室,被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,并被责令多次检讨,险些当了“右派”。随后被调至吉林,在长春定居。

从1957年后半年开始,父亲就不像过去那么忙着天天上班了,大部分时间是坐在书房看书,或者和孩子们在屋外窗下的小片地上种花,甚至有时间来管家事了。母亲爱花,但是一直只能在家里养几盆仙人掌什么的。那年父亲在窗外栽种过几株玫瑰;还买了竹竿,把种了玫瑰花的那一小片土地围起来,整整齐齐的竹篱笆,很像园丁的作品。不过我们没有等到看玫瑰开花。

1958年春,父亲要“下放劳动”了,地点是河北赞皇农村。他走前,4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下午,全家到五道口的照相馆照了惟一的“全家福”像。父亲这一走就是七八个月,当他于1958年底回北京时,我们家已经搬到百万庄建工部宿舍了。

1958年的印象

1958年春大跃进,记忆中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。小学生们上街宣传除“四害”、讲卫生、打麻雀等等。搞绿化,参加挖树坑,著名的中关村林荫道,就有我们的一份贡献。记得1958年暑假期间粮食高产运动,保福寺小学也搞了半亩地种冬小麦,目标是亩产4万斤,全校在假期紧急动员搞积肥。动员大会上有的老师甚至激动得流了眼泪。此后全校师生掀起了“冲天的革命干劲”,低年级同学在林荫道上拾马粪,互相竞赛;高年级同学和老师们的去掏大粪,然后摊在操场上晒成粪干。半亩地挖了个大坑,全部填上肥料。播种应该是9月底,我们已经搬家,此后就不知道这个高产试验田的消息了。几年后在中学碰到小学的同学打听,说是半亩地打了200斤小麦(这在当时也是很不错的成绩了)。

1958年秋季开学时,新校舍盖好了,保福寺小学搬至今天的中关村一小所在地,校名也改了。

1958年夏,家里发生了若干变故。父亲下放后,母亲在单位忙,天天很晚才回家;大姐顾淑林住校基本不回家(当时暑假期间在学校里参加化工试

验小组,日后 101 中学还出了一本小书《我们试制成功了环氧树脂》)。保姆走了,只有祖母在家做饭和照顾几个小的孩子。一天雨后的傍晚,70 多岁的祖母去屋外照看开花的向日葵,不小心滑倒,右大腿骨折,我们几个小孩手足无措,是路过的一位叔叔帮忙叫来救护车,送祖母到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。这样,家里白天只剩下大哥顾逸东带着下面的三个弟妹,做功课、玩耍、学做饭,自己管理自己,感觉还挺不错。不久后,上海的大姑来北京照顾我们和在积水潭医院住院的祖母。大姑走后,8 月底小姑带着两个孩子(我们的表妹表弟)来到北京,小姑夫所在志愿军部队从朝鲜班师回国,他们在北京会合,也都到中关村 13 楼来过。

父亲当了“右派”,我们在 13 楼住不下去了。母亲向所在单位建工部要了百万庄的房子,小姑帮我们张罗了搬家的种种事项。这样,我们在 1958 年 9 月初,新学期刚刚开始两周时,搬离了中关村 13 楼。我们在中关村 13 楼居住,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。

此后的情况

百万庄宿舍是两室一厅,60~70 平方米,全家如果聚齐,睡觉就要架行军床。父亲从 1958 到 1961 年人都在外地,先后在河北河南农村、院属清河农场和商都农场劳动,在家时间很少。1959 年他在河南商城参加修水库劳动,正值农村“反右倾”征过头粮,农民口粮难以为继,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得了浮肿病,还要干重活。眼见农村开始饿死人(1959 年秋河南遭灾加高征购,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,父亲是 1960 年 1 月回的北京)。这一经历给父亲的印象太深刻了。

父亲青少年时为救国救民参加革命,没想到胜利后没几天,自己没什么问题倒成了“革命对象”;父亲是一心求实求真的人,既不懂官场“艺术”,也藏不住话。在外面无处讲,到家就很难憋得住了,往往一开口就措辞尖锐,批评大炼钢铁、人民公社等等。为此母亲没少和他怄气:“你跟小孩子讲这些干什么?”

1961 年,在老朋友、时任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的努力下,父亲到经

济所当研究员,并摘了“右派帽子”。尽管那篇“试论”被经济所的人批评过,但他仍本着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的精神和大家讨论,虚心接受合理批评,继续深入研究,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。

1964年秋冬,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搞“四清”。工作组矛头直指孙冶方,父亲也在劫难逃。“四清”不久就被隔离审查,后送到京郊劳动,1965年夏才让回家,然后再次被带上“右派帽子”。1966年8月某日人民日报第八版通栏标题“批判孙冶方反革命修正主义——经济所革命群众大字报选登”,其中有一篇“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”,点了顾准、林里夫的名,顾准被称为“极右分子”。

从“文革”起,父亲和家庭就断绝了往来。日后所知,1966年8月父亲在农村被揪回经济所前夕,曾被当地农民“红卫兵”批斗殴打,血湿衣衫;回所后、直至后来到干校,屡次被批斗。一次“革命群众”批他是“老反革命”,他火冒三丈,大声说“我是老革命,不是反革命”,在被人推搡压制中,硬是昂头梗着脖子说:“我就是不服。”1969年下干校的前两年,曾有多起外调人员来找他,要他提供过去共事过的同志、今日“走资派”的历史情况,他都据实回答或提供文字材料,绝不说违心的话。有外调者要他提供假证、甚至威胁殴打,都是一口回绝。他曾说过:“我没有害过一个人。”外调勾起了他对自己革命历史的系统回忆,据此写下了25万字的“自述”,是很有价值的史料。尽管受到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,但在他留下的字里行间处处可看到,他仍对自己曾参加过的伟大革命斗争充满了感情,对国家未来的建设和腾飞充满了期待。

“文革”中,父亲带着“右派帽子”,屡遭不幸,孤身一人,扛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。在极“左”教条主义的高压下,在批斗和监督劳动之余,父亲心无旁骛,发奋读书研究。他的思想已远远超越了当时的“文革”“范式”。他计划从中西文明的比较中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,研究范围涉及经济、历史、哲学、政治各领域。但可惜的是,这一计划才开头,就于1974年因癌症去世。所留下的文章笔记,系统整理出书共100多万字。

母亲于“文革”前调财政部,“文革”期间因父亲的问题被冲击批斗,于

1968 年春去世。此后,我们 5 个兄弟姐妹有 4 人远赴外地,下乡进厂,直到 1979 年才在北京团聚。所幸祖母以 94 岁高龄,看到引为自豪的儿子终获昭雪、孙子们都回北京,放心而去(1979 年)。如今惟一值得告慰父母的是,我们兄弟姐妹们长大后,没有背离父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,在各自的岗位上,为人民、为国家尽着自己的努力去做工作。